

從霸權興衰看北京共識-----兼論其對拉丁美洲的意涵

包淳亮*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霸權意識型態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經聲言,「資本主義」指的就是整個世界體系,¹在這個世界體系中,有著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國家;而在核心國家中,又不時出現某個國家領袖群倫,即是所謂「霸權」。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所謂領導權(leadership)或者世界強權,²與華勒斯坦的霸權相似,都是軍事、政治,以及特別是經濟實力的展現。核心國家的實力地位乃與其相對經濟地位緊密並行,³如何實現經濟發展,實乃霸權護持之問題核心。

世界體系的論述中,霸權國家也是「現代文明」的代表。⁴根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學說,則霸權指稱具有統治的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知識與道德優勢,使之得以減少被壓迫者或下階層的質疑;⁵若將此概念放在世界體系上觀察,則核心國家,特別是霸權國家,所表現出的話語權優勢,以及所具有的道德知識的優越地位,雖然應當成為被審視的對象,但實際上具有最為強大的滲透力、影響力。這是由於霸權話語具有現實的權力為依託,與此相對,其替代性話語的權力依託則相對較小。霸權倘若出現競爭者,此競爭者亦將提出競爭性的意識形態,但在競爭者的發展過程中,其相對落後的現實,將持續成為干擾其話語有效性的依據。因為在霸權體系下,核心國家通常控制著邊陲地區,灌輸當地人一種自身文化較為低劣的意識,邊陲地區仰望核心地區、更仰望霸權國家;而處於半邊陲的國家倘若成為霸權挑戰者,則很少享有此種軟權力的優勢。

* 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主要關注中國崛起所涉及的政治、經濟挑戰。聯絡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 225 巷 22 號 4 樓之 1,聯絡電話:0928797623,電子郵件:solpao@gmail.com。

¹ 柯志明,〈華勒斯坦訪問錄〉,於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郭方等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三卷)》(*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台北:桂冠,2000),頁 410。

²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 17-8. 另參 Robert Gilpin, *Challenge to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0; John J. Kirton and George M. von Furstenburg eds., *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 Manag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³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Y: Random House, 1987).

⁴ Taylor,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p. 38-42, 120.

⁵ Antonio Gramsci,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Y: NYU Press, 2000).

相對來說，霸權國家相對於其他核心國家，在硬實力上的優勢較少，於是「文化上的優勢較少，僅是作為榜樣的作用而出現」，⁶ 其他核心國家不僅較容易成為霸權競爭者，也較容易提出競爭性的意識形態。然而，霸權通常是核心國家當中規模最大的國家，因此其意識形態往往代表核心國家的整體利益，這也就又限制了其他核心國家提出意識型態挑戰的空間。於是出現霸權意識型態競爭的場景，通常是由原來處於半邊陲地位的國家，至少相對落後於霸權的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所提出。荷蘭霸權、英國霸權，乃至於美國霸權皆是如此。換句話說，霸權挑戰者的經濟規模雖然仍遜於霸權國家，但其「增量」巨大，使其有成為霸權的潛力，於是使之可能產生挑戰性的話語。

表一 霸權的貿易政策與其主要對手

霸權循環	「普世」理論	對手的「特殊論」
荷蘭	葛老休斯(Hugo Grotius)的「海上自由論 (mare liberum)」	英格蘭：曼(Thomas Mun)的重商主義 法國：柯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主義
英國	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學說，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利益說	德國：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保護主義 美國：共和黨的關稅政策
美國	現代經濟的古典的(orthodoxy)自由企業	蘇聯：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一國社會主義」 日本：「隱藏的」(hidden)保護主義

Peter J. Taylor,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 World Hegemony to World Impasse* (West Sussex,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6), p. 34.

各種相關話語的內容與權力，不能與經濟實力與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切割；通常霸權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因為自由貿易對於產業競爭力最強大的霸權國家最為有利；但霸權對手，特別是相對落後的挑戰國，則往往採取某種「特殊論」，提出某種重商主義。德國經濟學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早在其 1844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即指出先進國家經濟政策，未必適用於落後國家；⁷ 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對於當時最先進的英國是非常有利，但落後國家若不能提出有效的產業政策，則其發展將始終落後於先進國家。何況英國事實上也並非自由放任，而往往對威脅其產業的外國製品加以阻撓干涉。

因此，霸權雖然在過去數百年有所更易，但其與對手的意識形態之爭，卻表現得頗為相似。霸權主張普世理論，並且使得許多國家，在接受霸權提供的安全或經濟援助時，接受其意識形態指導；霸權之外的其他核心國家，由於分享了既

⁶ 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卷)》，頁 93。

⁷ 李斯特(Friedrich List)，邱偉立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北京：華夏出版，2009 年 01 月 01 日)。

有的世界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則很難提出極具差異性的意識型態挑戰；而處於落後位置的霸權挑戰者，則往往主張特殊論，而這種特殊論在經濟上具有重商主義或保護主義色彩，在政治上強調獨立自主、尊重主權等。進一步言，則此一霸權挑戰國不可能處於邊陲國家的位置，而至少應已邁入半邊陲，否則其全面性落後的經濟與社會，亦很難具有吸引他國的可能。

圖一 世界體系下的意識型態

霸權國家： 普世理論、自由貿易	具有挑戰霸權可能的半邊陲大國： ↔ 提出特殊性理論、 重商主義、強調主權	↔ 挑戰性的邊陲國家： 流氓國家？
其他核心國家： 分享既有國際體制，提出 修補性的意識型態		
其他半邊陲國家： 部分的接受既有秩序，不大支持挑戰者		
其他邊陲國家： 部分的接受既有秩序，或支持挑戰者		

(包淳亮製圖)

回顧過往，一旦處於半邊陲地位的霸權挑戰者也成為核心國家，則可能出現三種狀況：其一，新霸權由於巨大規模而替代了既有的霸權，如英國替代荷蘭、美國替代英國，於是霸權話語雖然未變，但發話者改變。其二，倘若核心國家的規模差距不夠懸殊，則不無導向核心國家之間全面衝突的可能，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與英國；為避免此種衝突，國際政治學界的自由主義學派，提出建設相對公平的國際建制以降低衝突。其三，由於挑戰者規模較小，在躋身核心國家行列之後，成為既有霸權體系的支持者，如二次大戰之後，西歐與日本成為美國的支持者。

基於上述，下文將簡要分析以下現象：一、美國在什麼時機提出華盛頓共識？為什麼拉丁美洲接受此一說詞？二、歐洲價值觀如何挑戰華盛頓共識？其挑戰又為什麼是有限的？三、中國的北京共識是怎麼被提出？對於拉丁美洲而言，北京共識又為何僅被有限的支持？

二、華盛頓共識

1970 年代後期，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國、歐盟、日本作為經濟世界

的三大中心之說深入人心，⁸ 蘇聯在國際社會亦持續挑戰美國，但到了 1980 年代後期，美國利用廣場協定，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獲益，並使其西歐、日本與拉丁美洲的盟友支付代價，⁹ 另一方面則是蘇聯集團的瓦解，於是在 1990 年之後的十餘年間，美國一國的經濟實力達到其他主要挑戰者總和的程度，軍事支出亦達世界的近半，可以說已經符合了嚴格的霸權標準。於是 1970 與 80 年代對霸權終結的憂慮在 1990 年代快速轉變為對自身安全的昂然得意，並認為美國可以在自己所樂意的時間與地點進行所欲的干涉。¹⁰

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的霸權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替代，因為資本主義文明與自由民主體制，使之充滿韌性。¹¹ 輿論為此在意識形態上歡迎「歷史終結論」，在國際地位上提出「注定領導」，在全球經濟安排上指出「帝國」的建立。¹² 伴隨著美國獨強，而成為此一時期世界主流話語的，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此一 1970 年代後期開始的意識型態，源自對二戰之後福利國家的反挫，強調減少政府管制，讓政府從經濟事務中脫身；並且開放國內市場，將公用事業和自然資源部門的投資私有化，廢止最具保護色彩的勞工法律，頒佈強有力的保護國內外私有財產權的法規，減少對公共衛生的投資和社會福利。此一變化，對學術、政治、社會思潮構成整體影響，構成引人注目的「全球化」思潮，並也因此與一些其他的概念息息相關；在經濟理論上，稱為「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界，稱為「華盛頓共識」；在學術圈稱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公眾意識形態中稱為「全球主義」，或者稱為「全球化」，也有人稱之為「新經濟」。¹³

如上所述，美國作為核心國家中的霸權國家，其話語權具有強大的實力依據，因此上述思潮，乃成為許多國家的政策指導。在這當中，「華盛頓共識」是由曾擔任世界銀行的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於 1989 年提出，他系統地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支持；這些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後來人們將這

⁸ 例見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2ed Edition)(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9), pp. 70-80.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2), P. 51.

⁹ John A. Hall, *International Order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6), p. 148. Steven Krasner, *Structure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¹⁰ Robert A. Pape, "Empire Fall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Feb. 2009, No. 99, p. 29-30.

¹¹ Lawrence Freedman, "A Subversive on a 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09, No. 101, pp. 39-48.

¹²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1992).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199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¹³ 約翰遜，《帝國的悲哀》，頁 305-6。

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但根據「華盛頓共識」來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幾乎是災難性的後果。¹⁴

其實會出現災難後果的原因並不奇怪，因為華盛頓共識的調整方案，在其原初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債權國逼迫債務國還債的計畫，而不是為了發展窮國經濟而制定的方案。另一方面，布希執政八年期間的反恐政策，導致美國外交集中於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朝核，拉丁美洲相對被忽略。再者由於拉美多國陷入外債困境，導致左派政府上臺後反美情緒更加高漲。而 2008 年起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不但重創歐美銀行體系，也動搖了長期主導西方經濟思維的自由市場觀念，於是華盛頓共識為一種意識形態似乎失敗了。¹⁵ 但在華盛頓共識之後，主導全球的意識型態會是什麼呢？

三、後華盛頓共識與歐洲價值觀

作為全球主流的發展理念，「華盛頓共識」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戰。世紀之交的數年間，華盛頓共識的批評者們陸續提出過其他幾項可替代性共識，包括蒙特雷共識 (Monterrey Consensus)、哥本哈根共識 (the Copenhagen Consensus)、墨西哥共識 (the Mexico Consensus) 和南方共識 (the Southern Consensus)。¹⁶ 但這些共識都沒有足夠的實力依託，多數也未引起太多關注。真正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兩種意識形態說詞，仍然來自西方主流社會，分別是後華盛頓共識與歐洲價值觀。

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提出的「後華盛頓共識」，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例如貧困、收入分配、環境可持續性等問題。它還從資訊不對稱出發，指出市場力量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承認政府在促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宣導的私有化、資本帳戶開放和經濟緊縮政策。¹⁷

¹⁴ 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聯合早報》，2010 年 4 月 22 日，http://www.zaobao.com/yl/tx100422_001.shtml。

趙曉，〈從華盛頓共識到 北京共識〉，《中國經濟週刊》，2004 年第 33 期，轉載自《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2870/1157164.html>。

〈中國經濟學何處去——林毅夫訪談〉，《21 世紀經濟報導》，2005 年 9 月 5 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50905/pl/200509050145.asp>。

¹⁵ 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聯合早報》，2010 年 4 月 22 日，http://www.zaobao.com/yl/tx100422_001.shtml。

¹⁶ 斯科特·甘迺迪 (Scott Kennedy)、王雪，〈北京共識的神話〉，《國外理論動態》，2010 年第 4 期，2010 年 4 月 25 日，轉引《中國改革網》，<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425/16053.html>。

¹⁷ 斯氏相關著作甚多，例見 Joseph E. Stiglitz, *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Perseus Distribution Services,

然而，出身霸權國家的學者，雖然具有較高的影響力，但沒有「霸權國家」的背書，缺乏以國家名義支持的各種金融安排、援助，這種「後華盛頓共識」就僅僅是學說，不能成為動搖霸權意識型態的真正動力。相反的，倘若此一「後華盛頓共識」得到霸權國家的支持，又會很快被吸納為霸權意識型態的一部分，成為服務於霸權的意識形態工具，因此這種挑戰雖然可能在學術上有力，但並不具有改變霸權地位的作用。「後華盛頓共識」仍來自於華盛頓，這就是霸權意識型態的頑固性。

相對於「後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另一個挑戰者「歐洲價值觀」，則具有實力為基礎。在 1990 年代開始的十餘年間，世界主要的經濟實體，除了美國，就是歐洲聯盟；歐盟雖然並非一個國家，但卻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經濟板塊。美國學者庫普乾(Charles Kupchan)甚至認為歐盟會是讓美國時代終結的力量。¹⁸ 歐洲學者里歐納德(Mark Leonard)也指出，歐洲可以成為一個與美國競爭的力量。¹⁹

在美國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2009 年 4 月，在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英國首相布朗宣告「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²⁰ 也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因為歐洲價值觀正是立足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理念，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宣導人權、環保、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在與美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歐洲國家在政策導向上整體向「華盛頓共識」靠近，因此「歐洲價值觀」對「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是軟弱乏力的。²¹

進一步來說，歐洲價值觀雖然非常高尚，但卻也是核心國家的意識型態；其所強調的分配價值，是立足於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基礎，對於多數半邊陲與邊陲國家來說高不可攀，其核心國家的意識形態保守色彩，對於多數相對落後國家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總之，歐洲價值觀與後華盛頓共識一般，都僅是核心國家學者對於霸權意識型態「華盛頓共識」的修補，而非真正的挑戰。

四、中國崛起與北京共識

與來自核心國家的「後華盛頓共識」以及「歐洲價值觀」不同，中國在廿世

2010)。相關評論，見趙曉，〈從華盛頓共識到 北京共識〉。

¹⁸ 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潘忠岐，《美國時代的終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¹⁹ 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廖海燕，《歐洲如何打造 21 世紀》(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09 年 9 月 7 日)。

²⁰ Jonathan Weisman & Alistair MacDonald, "Obama, Brown Strike Similar Notes on Econom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871661163384723.html>.

²¹ 趙曉，〈從 華盛頓共識 到 北京共識 〉。

紀長期處於邊陲國家的地位，²² 在中共建政的前廿年，中國政府支持其他邊陲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甚至被核心國家視為「流氓國家」。²³ 與美國妥協之後，逐漸開啟改革開放，但直到 1990 年代後期，中國政權合法性尚未成功重建，國力較為弱小，被受到核心國家所支持的「顏色革命」所支解，曾經成為中國的夢魘，²⁴ 在「失敗情結」或「落後情結」的壓力下，中國學者也沒有提出任何具有挑戰性的意識形態的能力。²⁵

不僅沒有建立挑戰性意識型態，相反的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似乎成為「華盛頓共識」的最好樣板。廿世紀末，中國開始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與群眾情緒都帶有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特徵：擁抱財富、擁抱創業家、容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國家不再提供教育與醫療等公共財、快速降低關稅障礙、採取極度開放的貿易政策，這一切都在江澤民統治時趨於明顯。²⁶

然而，由於中國具有遠大於美國的人口，使其在廿一世紀初，從低收入國家提升為下中等收入國家，或者說從「邊陲國家」晉升為「半邊陲國家」不久，其國內生產總值就已超過絕大多數「核心國家」。2003 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出口第三大國，其經濟規模並已明顯將超越義大利、法國與英國；2007 年中國 GDP 超過德國，2010 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二大國。有此持續的經濟增長作後盾，「北京共識」乃隨之出現，並被認為最有可能對「華盛頓共識」形成新的強有力的挑戰。²⁷

2004 年 5 月 11 日，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於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²⁸ 對中國廿多年的經濟改革成就及其經驗作了分析。雷默指出革新、試驗、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在發展的過程中要積極維護國家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處理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矛盾，要重視自主發展，在保持國家獨立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創新和試驗是「北京共識」的靈魂，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靈活應對，不求統一標準。雷默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增長

²² Thomas Richard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 64, 84.

²³ L.J. Goldstein, "When China was a 'rogue state': the impact of Chin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on US-China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2, Number 37, November 2003, pp. 739-764.

²⁴ Christopher March & Nikolas K. Gvosdev, "China's Yugoslav Nightma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6, No. 84, p. 102-8.

²⁵ 趙憶寧，〈戰略學者眼中的 北京共識——北京共識 專題之二〉，《21 世紀經濟報導》，2010 年 03 月 12 日，轉引自《中國改革網》，<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312/13883.html>。

²⁶ 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李隆生、張逸安譯，《當中國統治世界》(台北：聯經，2010 年)，頁 198-199。

²⁷ 趙曉，〈從華盛頓共識 到 北京共識〉。

²⁸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5.11),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樣。相對於美國正在推行的旨在保護美國利益的單邊主義政策，中國則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國家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使他們不僅能夠自主的弄清如何發展、與國際秩序接軌，同時能夠實現獨立。

29

英國學者里歐納德認為，「將中國所有關於全球化的新觀念串聯一氣的是對主權在握的渴求。中國思想家希望各國政府都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再受全球資本和美國外交政策的任意擺佈，這才是他們想要創造的世界。他們追求世界各地的資本、技術和市場，唯獨不想吸收西方的價值觀。」³⁰ 這種說法似乎得到北京學者的呼應；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挑戰了西方經濟學知識裡的“市場與計劃兩分”，西方政治學知識裡的“民主與專制兩分”，西方社會學知識裡的“國家與社會兩分”。」³¹ 北京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甚至指出自 2008 年經濟危機以來，全球對美國經濟模式的信心不比以前，因此「『北京共識』非常可能取代『華盛頓共識』」。³² 而這種取代將不僅是經濟的，因為「北京共識」還考慮到社會和國家安全策略，³³ 因此堪稱是對霸權意識型態的全面性挑戰。³⁴

如前文所述，由於中國並非核心國家成員，因此其意識形態更為強調國家自主、特殊性，而這種對於自主的強調一旦能夠發揮作用，就使其他處於相對邊陲地位的國家此一自主意識的可信。於是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也許窮國會首先歡迎中國，並接受中國的領導與榜樣。³⁵ 但這並非因為他們希望服從中國，而是因為中國的角色使得他們在西方之外有了選擇，有了更多自主性。

五、拉丁美洲倒向北京共識？

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存在，開始在廿一世紀開始之後。2001 年 4 月

²⁹ 周春波，〈華盛頓共識的破產到未成體系的北京共識〉，《現代經濟》，上傳於 2007 年 9 月 13 日，〈<http://www.mejc.net/ReadNews.asp?TypeId=16&NewsId=610>〉。

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

³⁰ 里歐納德(Mark Leonard)著，林雨蓀譯，《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 (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頁 151。

³¹ 〈潘維：中國經濟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訪北京大學潘維教授〉，《紅旗文稿》，2010 年 04 月 27 日，轉載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1466658.html>。

³² 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聯合早報》，2010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zaobao.com/yl/tx100422_001.shtml。

³³ 〈“北京共識”論之父：拉美國家應借鑒中國模式〉，《新京報》，2009 年 09 月 23 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ongguojingyan/200909/0923_8129_1361587.shtml。

³⁴ 因此西方學者分析北京共識，強調其為一種威權模式，也就不值為怪。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sic, 2010).

³⁵ Starobin, *After America*, pp. 204-210.

江澤民對拉丁美洲的十三天訪問行程，被視為中國進軍拉丁美洲的開端；2004 年開始，中國涉足海地聯合國維和部隊，使中國軍隊踏入西半球；2007 年開始中國參加了美洲發展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標誌了中國的經濟力量已深入拉丁美洲。³⁶

這十年之間，中國經濟實力不斷茁壯，提出「後華盛頓共識」的斯蒂格利茨認為，為扮演進行全球領導的新角色，首先，中國將提供一種模式，讓各國在華盛頓共識之外有更好的發展參考，其次，中國連同巴西與印度，將協助開發中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得到更公平的談判協議。³⁷ 換句話說，一方面是本文的「北京共識」的出現，二方面是中國對於其能夠協助其他開發中國家發展的意識型態的現實的支持。倘若中國能帶領開發中國家共同發展，則西方學者擔心的所謂中國的軟實力增長與「魅力攻勢」，³⁸ 就不僅是一種替代性話語的出現，且也具有堅實的國際政治支持。這就可能回過頭來成為霸權更替的重要註腳。

到目前為止，中國帶領開發中國家共同發展的現象，在非洲表現得比較明顯。雖然有許多可受批評之處，但中國確實已成為近年非洲發展的重要動力。³⁹ 然而與非洲不同，拉丁美洲並沒有冷戰時期與中國並肩對抗帝國主義的過往，主要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無論從總額或人均來說，也都遠高於非洲國家，何況其中許多國家的人均GDP甚至還較中國為高，因此與中國的心理距離更大。⁴⁰ 雖然一些學者指出，布希執政的 8 年也是中國和拉美關係突飛猛進的 8 年，「北京共識」因此也開始受到拉美國家的青睞。⁴¹ 不過拉丁美洲對於中國的發展前景，實則仍不無保留。

誠如巴西前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所說的，「中國現在正進入從鄉村到都市社會的過渡時期，許多觀察家著迷於中國大吹打播的快速轉型，似乎忘了這樣的社會變遷會多麼動盪不安。別忘了，中國尚未過渡為民主呢。一旦此一過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場煙火大秀才正要開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轉型，會不會像二十世紀的巴西那樣問題叢生，還有待觀察。」⁴² 這種態度反映出

³⁶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Library of Congress,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oft Power in South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D.C.: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008), P. 16-9.

³⁷ Joseph E. Stiglitz,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Responsibilities," in Lok Sang Ho and Robert Ash eds., *China,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 Studies on Global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7-31.

³⁸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³⁹ 關於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可參 Serge Michel、Michel Beuret、Paolo Woods 著，陳虹君譯，《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台北：早安財經，2009 年)。

⁴⁰ 關於拉丁美洲的歷史，可參張翠容，《拉丁美洲真相之路》(台北：馬可孛羅，2009 年)。關於各國的輿論狀況，可參考 *World Public Opinion*, <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

⁴¹ 向駿，〈華盛頓共識 vs 北京共識〉。

⁴² 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著，林志懋譯，《巴西，如斯壯麗-----傳奇總統卡多索回憶

一個遠比中國更早擺脫邊陲國家地位的半邊陲大國，或者一個已經邁入民主化的、在「政治發展」上相對更為「成熟」的大國，看待新興的、另一個半邊陲大國的有所保留的心態。與巴西相似的，恐怕還包括另一個拉美大國墨西哥。

因此雖然隨著中國的發展，各國可能要在美、中之間選邊，⁴³ 但以目前的態勢而言，如果美國舉措得宜，拉丁美洲的國家會支持的恐怕不是仍然一黨專政的中國，而更可能是歐巴馬主政的美國。這是相對落後、仍為半邊陲國家的中國，面對其他發展階段、或說人均所得更高的國家，所具有的軟權力侷限性。

六、結語：新瓶裝舊酒？

中國快速發展，「北京共識」逐漸成為顯學，但是關於中國操弄人民幣的指責，近年也極為普遍。不僅已開發國家的產業受到中國的競爭，發展中國家也受到極大的競爭壓力。學者認為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美國「保護主義」無不可能捲土重來，⁴⁴ 而當自由貿易愈來愈不利於西方，則西方可能傾向於保護主義，因此破壞目前的全球體系。⁴⁵ 其他發展中國家，亦可能視中國為麻煩製造者，使中國處於極為不利的全球壓力之下。

從世界體系的理論來看，支持自由貿易者乃處於核心地位，因此對於貿易體系的支持與否，也可用以判斷霸權的興衰。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強勢表現，不僅使中國似乎成為「自由貿易」的最堅定支持者，也或許是中國邁向霸權過程的必然。

對於中國來說，理想的未來是世界維持開放，中國現代化之後躋身核心國家，並且以自身的巨大規模，和平的替代美國成為新的霸權，承擔維持世界秩序，特別是貿易、金融秩序的责任。中國將繼續支持自由貿易，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不過由於中國並非西方國家，此一霸權轉移對於其他文明具有難以估量的鼓勵作用。中國巨大的規模，也意味人類現代化的一大進展，有力的促進全人類社會的普遍的現代化。就此來說，雖然霸權轉移之後繼承了同樣的意識型態，但並非沒有新的意義。

錄》(*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sil: A Memoir*)(台北：早安財經文化，2010年)，頁340。

⁴³ G. John Ikenberry, "A New Order in East Asia?" edited by Kent E. Calder & Francis Fukuyama,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 Prospect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17-233.

⁴⁴ 例如美國若在國際政治或國際經濟上遇到挫折，容易表現出孤立主義的傾向。Bruce E. Mo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ization," in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 D. Underhill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Onta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42-343.

⁴⁵ 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頁237。

就拉丁美洲來說，首先，由於中國的相對落後，使拉美國家對於中國的發展，仍抱持頗深的猶豫、懷疑，因此中國首先得在發展程度上，超過墨西哥、巴西、智利等拉美大國，才可能為拉美國家提供更具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驗。其次，中國 GDP 的增加值目前已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乃至於在 2009 年前後的世界經濟危機之際佔世界新增 GDP 的近半，這種狀況若能持續一段時間，中國發展的經驗會具有遠高於其 GDP 總額的參考價值，使「北京共識」更容易獲得世界的認可。其三，這種高速發展若能再持續十餘年，將可能帶動霸權更替，同時也就將給予拉美擺脫美國霸權宰制的強大動能，於是拉美不僅在外部環境、且在心理上都可能獲得較大的自由。最後，由於拉丁美洲被視為美國的後院，因此「華盛頓」與「北京」在國際社會影響力的角逐，最終也或將由拉美加以裁判。

總之，如果真有一個「北京共識」，他目前僅是一種防禦性的意識形態，可以加強各國做出自身選擇的自信，但還不是像華盛頓共識那樣的進攻性意識形態，可以拿來要求別人。當然，如果未來真的出現了一個具有進攻性意義的、基於霸權利益的「北京共識」，這個北京共識或許也和目前的「北京共識」南轅北轍-----不無成為新時代的華盛頓共識的可能。大陸學者提出的「天下主義」，也許是未來時代的「後北京共識」，值得加以觀察。⁴⁶

⁴⁶ 趙汀陽，〈『天下概念』與世界制度〉，秦亞青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際秩序卷》（香港：和平圖書出版社，2006），頁 3-46。